



# 制度环境与心理认知何时激活创业？

——一个基于QCA方法的研究

程建青<sup>1,2</sup> 罗瑾琰<sup>1</sup> 杜运周<sup>3</sup> 闫佳祺<sup>1</sup> 钟 竞<sup>1</sup>

(1.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2; 2. 大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云南 大理 671000;  
3.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6)

**摘要:**以25个效率驱动国家为样本,应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整合制度环境层面与心理认知层面的5个条件,探讨影响国家间创业活跃度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结果发现:(1)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2条路径,即管制-规范主导型与认知主导型。其中,第一条路径指高创业意愿、高创业机会识别、优越的管制制度与规范制度的联动匹配,第二条路径指高创业意愿、高创业机会识别与优越的认知制度的联动匹配;(2)较之于管制-规范主导型,认知主导型更可能有效地激活高创业活跃度;(3)2条路径所涉及的制度三要素在解释创业活动时存在替代作用,即创业意愿与创业机会识别水平较高时,只要认知优越,或者管制与规范同时优越,即可驱动高创业活跃度;(4)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3条路径,且与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关键词:**创业;创业活动;制度环境;组态思维;QCA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41(2019)02-0114-18

## 0 引言

创业对创新、就业、财富创造等方面的推动作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认可,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sup>①</sup>,对于效率驱动国家而言,创业在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愈发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简称GEM)报告显示<sup>②</sup>,新世纪以来,作为效率驱动国家的后起之秀,我国在创业方面

取得的成绩备受瞩目,特别是早期创业指数(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简称TEA)一路攀升,甚至一度高于美、日等创新驱动国家。然而,近3年来,我国创业活跃度不断下滑,尤其是2017年TEA指数竟跌至9.9%,甚至远低于效率驱动国家平均水平。在经济增速逐步放缓进入“新常态”的关键时期,如何提升我国的创业活跃度,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课题,这对深入落实“大众创业、

收稿日期:2018-06-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72138;71672033)

第一作者简介:程建青(1986—),男,山西吕梁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创业、领导力。

通信作者:杜运周, yunzhou@seu.edu.cn

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是国际上从事竞争力评价最著名的机构之一,每年会推出《全球竞争力报告》。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根据人均GDP以及初级产品占出口份额的情况,把经济体分为3个层次:要素驱动型国家,效率驱动型国家和创新驱动型国家,其中,效率驱动国家(efficiency-driven economies)是指效率驱动阶段,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和对规模经济的日益依赖,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更占优势。该阶段一般伴随的是基本需求的不断改善,关注的重点在于开发效率驱动点,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也是效率驱动国家。GEM在研究中采用了这种划分标准。

②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组织自1999年后,每年发布一次创业报告,截至2017年,有100多个经济体参加了GEM调查(我国于2002年加入),调查范围约占世界人口的75%,几乎涉及所有的地理区域,约占世界GDP的90%。

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比国际创业活动的差异,借鉴别国的创业经验,对提升本国创业活跃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创业国家间差异的潜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解读,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创业是一个涵盖了宏观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微观个体特征等多个层面要素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受诸多先发条件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演进、社会规范、个体特质等(Ali et al, 2013; 李新春等, 2017; 赵向阳等, 2012; 郑馨等, 2017)。对效率驱动国家而言,制度环境与心理认知层面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尤为突出,这是因为效率驱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这为创业提供了一个机会与挑战并存的特殊环境,特别是各国制度迥异,创业者要增强对制度环境的心理认知能力、以应对制度环境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苏郁锋等, 2017; 项国鹏等, 2009)。关于制度环境或心理认知层面影响创业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层面,2个层面协同联动影响创业活动的内在机制尚不明确,这忽视了跨国情境下多重因素并发可能对创业的影响,导致现有结论不一致(Kiss等, 2012; Lim等, 2016)。

事实上,创业是一个受个体与情境因素协同影响的复杂过程(Lim等, 2016; Shane等, 2000; 赵向阳等, 2012)。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以下简称QCA)采用整体视角,注重挖掘前因复杂性,综合了传统研究范式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2种方法的优点(杜运周等, 2017; 闫佳祺等, 2018),成为管理、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领域解决因果关系复杂性的重要工具(Fiss等, 2007, 2011; Misangyi等, 2017),能够充

分挖掘2个及多个层面前因条件的协同联动对创业的影响机制。有鉴于此,本文将QCA引入创业研究中,将微观心理认知层面的创业意向、创业机会识别及宏观制度环境层面的管制制度、规范制度与认知制度进行整合,试图研究由5个前因条件组成的不同组态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挖掘创业活力的提升路径。具体地,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激活创业存在哪些路径?哪些路径能更高效地激活创业?哪些路径使激活创业受到制约?激活创业的路径与抑制创业的路径有何联系?

## 1 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创业是创建一个新事业(Low et al, 2007)。为了较为全面分析创业活动的驱动机制问题,当前国内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可分为宏观环境及微观个体因素2类。

宏观层面,学者强调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文化、制度差异等环境因素对创业的影响,尤其是政府政策等制度环境对国家创业起更直接的作用。近年来兴起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创业活动(Bruton et al, 2010)。事实上,特定制度安排是进行创业研究的基本前提,制度不同会导致创业活动水平的差异(Scott et al, 2001; 蔡莉等, 2011; 王玲玲等, 2017)。总体而言,制度环境越优良,创业活跃度越高(Lim等, 2016; 高辉, 2017; 胡玲玉等, 2014)。然而,现有研究也不乏结论不一致的解读。以社会规范为例,有学者发现,社会规范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国家层面的社会规范支持程度越高,个体越有可能创业(郑馨等, 2017)。然而,相反的研究却发现,社会规范并不影响创业活动,创业决策并不受其社会群体是否积极期待的影响(Sommer et al, 2011)。

微观层面,包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认知特征等,其中,包含创业意向、创业机会识别等心理认知特征起更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对于金





受雇于他人”这一创业研究领域的基本命题(Wu et al, 2008)。Krueger(2000)甚至认为,创业是有意向性的,创业意向针对有计划的行为,是创业行为唯一、最好的预测变量。

随着对创业意愿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出诸多反映创业意愿前因机制模型。其中,创业事件模型、计划行为模型对创业意向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认为个体或社会因素都必须通过创业意向来影响创业行为。实证研究也表明,个体进行某项行为的意向越显著,其实际进行这项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罗瑾琰等, 2015)。

### 1.1.2 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机会识别(EOI)是指通过识别一个好创意,并将其转化为商业概念(或对现有企业做相当程度的改进),从而增加顾客或社会价值,并且能够给创业者带来回报的能力(Lumpkin et al, 2005)。Shane等(2000)首次提出以“创业机会的识别、评价与开发利用”为主线进行创业过程研究,强调从创业机会的角度去探索创业过程的一般规律。由此形成了以创业机会识别为核心的创业过程学派。关于创业机会来源的问题中,主要存在2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是“机会发现论”,认为机会是独立于创业者的客观实在,有待警觉的创业者去发现(Shane et al, 2012; Shane et al, 2000);第二种是“机会创造论”,认为机会并非客观存在,也并非先于创业者意识,而是创业者与利益相关者在创业互动中建构的(Alvarez et al, 2007; Suddaby et al, 2015)。最近的研究表明,创业实践中,这2种理论都有体现,且向互相借鉴与融合的方向发展(Short et al, 2010; 斯晓夫等, 2016)。

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企业产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Alvarez et al, 2013),是创业行为产生的先导(Ozgen et al, 2007)。因为有价值的机会应对创业者具有吸引力,能够在现存的机会窗

口中执行以及创业者应具有创建企业所需的资源和技能(Timmons et al, 2010)。反过来,这些资源和技能又能促进创业者识别有价值的机会,从而促进创业行为的产生。实证研究也表明,创业机会识别能够显著改善绩效(郭海等, 2014)。

## 1.2 国家制度层面

### 1.2.1 管制

制度的管制要素(RD)类似于North提出的“游戏规则”(North et al, 1990),是指促进或制约特定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Busenitz et al, 2000)。创业领域的管制要素指政府为新创企业提供政府政策、法律与税收保护制度,以降低个人创办新企业的风险(Reynolds et al, 2005)。

政策支持有助于突破创业活动所面临的资金等资源瓶颈,特别是在转型经济中,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关键资源的掌控者,是影响企业的重要制度要素(Lim et al, 2016)。获得政府支持意味着创业者掌握了游戏规则,获得合法地位,能够获得稀缺资源,不仅为潜在创业者带来创业机会,而且能够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实证研究指出,保护知识产权的民主法律和政治制度,意味着政府比较重视这些企业,为创业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建立合法性提供制度保障,这向利益相关者(如投资者)传递有关企业质量和声誉的积极信号,会让投资者感知到自己的资产是受保护的,其投资积极性能够提高,从而促进利益相关者与创业企业的良性互动(王玲玲等, 2017)。

### 1.2.2 规范

制度的规范要素(ND)是指特定国家的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信念、规范、对人类行为的判断(Kostova et al, 2002)以及作为形成和限制人际互动基础的社会责任(Scott et al, 2001)。创业领域的规范要素指当地居民尊敬或羡慕创业行为、价值以及创新思想的程度(Manolova et al, 2008)。规范环境既赋予新创企业权利,同时也施加了义

务。创业活动应服从社会的道德伦理,接受公众的评判并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

如果当地居民积极支持与尊重创业活动,并将创业视为理想的职业选择,同时,周围人的榜样作用或示范效应,会增强个体创业意向,这也会激发潜在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提升创业自我效能感,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和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促进创业活跃度。相比之下,在规范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对创业活动、创新思想的认可度较低,整个社会缺乏鼓励创业、创新的文化氛围,创业活动就会受到抑制。实证研究也表明,社会规范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规范环境越宽松,创业意向越高(胡玲玉等, 2014),社会规范支持程度越高,个体越有可能进行创业(郑馨等, 2017)。

### 1.2.3 认知

制度的认知要素(CD)是指特定国家的个体所共享的知识及认知类型(Kostova et al, 2002)。创业领域的认知要素反映了创业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Busenitz et al, 2000)。它特别强调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是否致力于解决创建和经营新企业的有关问题(Lim et al, 2016; Reynolds et al, 2005)。

如果高等教育体系重视新企业的创建、成长与管理有关的问题,那么与这些问题有关的知识就有可能更加成熟先进。如果教育体系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如何制定搜集信息的创业战略计划和创造性地解读这些信息的概念性知识,那么创业者不仅可以通过学习管理知识、行业知识、政策知识、人文知识等来提高接收和处理信息能力、捕捉市场机遇能力、分析与决策能力等,及时识别创业机会,而且还可能激发其将创业当作职业选择的意识,从而推动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反之,如果缺乏如何制定搜集信息的创业战略计划和创造性地解读这些信息的概念性知识,创业者通常缺乏创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甚至都不知如何识别创业

机会、制定商业模式等,更不会产生将创业当作职业的想法,那么创业活动就会受到束缚。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创业教育系统能够为渴望创业的人们提供高素质的熟悉创业活动的人力资源,这样会有助于创业者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增强创业信心,从而激活创业活动(Lim et al, 2016)。实证研究也表明,创业教育能促进创业者创业导向的形成(任胜钢等, 2017)。

## 2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简称QCA)由美国社会学家Ragin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是一种“案例导向”的方法(Rihoux et al, 2009)。QCA方法旨在解决因果复杂性现象,同时兼顾外部的推广效度(杜运周等, 2017)。其基本思想是,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石,探究前因条件组合如何引致被解释结果出现可观测的变化或不连续(Fiss, 2011)(前因条件组合简称“组态”)。QCA方法采用整体(holistic)视角,更加符合管理实践的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和因果复杂性(multiple conjunctural causation)。QCA的整体视角根植于组态思维,组态思维认为“组织最好被理解为相互关联的结构和实践的集群而非分单元或者松散结合的实体,因而不能以孤立分析部件的方式理解组织”(Fiss, 2011)。组态思维采取整体和系统的分析思路,也即案例层面的组态而非单个自变量被用来分析结果。组态思维的多维度、整体性特征使得其具有分析战略管理等(如创业)问题的优势(杜运周等, 2017)。

QCA方法发展了新的因果关系——“多重并发因果关系”。QCA方法否定任何形式的恒定因果关系,认为因果关系是依赖特定情境和组态的。因此,它不同于试图发展出与数据拟合最好的单一因果模型的主流统计方法,而是关注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在多个可比较的案例之间

确定不同因果模型的数量和特征(伯努瓦·里豪克斯等, 2017)。通过放松主流统计学的若干假设, QCA方法拓展了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

(1) “可加性”(additivity)假设被打破。“单个原因对结果有其各自的和独立的影响”的思想不成立, 并且被“并发因果关系”的假设代替——多个原因同时出现(或者以某种形式整合)并构成某个结果的“组态”(伯努瓦·里豪克斯等, 2017)。主流统计学采用原子视角, 聚焦于分析单个变量的独特“净效应”(Rihoux et al, 2009)。然而, 当自变量间相互关联时, 单个变量的独特效应可能被相关变量掩盖。同时, 主流统计学方法使用调节变量分析的方法试图回答组态效应, 但3个以上的交互变量已经难以解释(杜运周等, 2017)。创业是一个各要素相互依赖、高度复杂的整体, 采用QCA方法可以更加逼近现实的创业现象, 深入地挖掘2个层面的5个条件所构成的组态与创业活动之间的联系。

(2) 组态间具有等效性(equifinality)。等效意指多种路径(组态)可以产生同一结果, 这就意味着实现某一期望结果或者出现非合意结果的可能路径是多样的, 并不存在传统分析方法中均衡的唯一最佳路径的解(杜运周等, 2017)。一个给定的原因组合可能并不是产生某个特定结果的唯一路径, 其他组合也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伯努瓦·里豪克斯等, 2017); 组态思维基于因果复杂性, 认为一阶要素并发, 形成各种不同的高阶组态对于结果可能具有等效的作用(Fiss et al, 2007; 伯努瓦·里豪克斯等, 2017)。主流统计分析不关注结果等效性的问题, 导致这一存在于管理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一直是未被深入挖掘的概念和领域(Fiss et al, 2007)。本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激活创业存在哪些路径?”采用QCA方法有助于探索激活创业的多条等效路径。

(3) 非对称性(asymmetry)假设。QCA的非对称假设可分为: 因果的非对称(Ragin et al,

2008; Rihoux et al, 2009), 以及条件作用的非对称性(Misangyi et al, 2017; 杜运周等, 2017)。因果的非对称性意味着某个结果的出现与否需要不同的“原因组合”来分别解释(Fiss et al, 2007; 伯努瓦·里豪克斯等, 2017)。如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不能简单运用成功原因的反面解释失败, 这也是一个研究所发现的变量间的统一对称关系, 常常被其他研究所否定的症结所在(杜运周等, 2017)。条件作用的非对称性指一个给定的原因与某些条件组合时可能对结果产生正的影响, 而与其他条件组合时, 则可能产生负向影响。条件作用的非对称性放松了线性回归中因果关系效应的统一性假定, 能够更好地解释案例间的差异性和条件间相互依赖的组态效应(杜运周等, 2017)。本文旨在探索创业活动的驱动机制。QCA方法的非对称性假设的优势使得研究问题更加聚焦, 同时有助于改善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 主流统计方法中的其他核心假设如线性假设等, 在QCA方法中也不存在(伯努瓦·里豪克斯等, 2017)。除此之外, QCA还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优点。原因如下: 常规的定性研究方法聚焦于单个或某几个案例的整体和深入分析, 但结论不能处理过多案例数, 外部效度较差。传统的定量分析具有分析大样本和揭示样本间共性规律的优势, 但变量分析只关注部分而非案例整体, 忽视了个案的独特性与深度, 难以揭示复杂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QCA弥补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不足, 既对于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分析, 也对研究对象整体进行分析(Whetten et al, 2009; 杜运周等, 2017), 不再局限于少数案例的限制和质疑, 同时通过整体的组态分析解决大样本分析不能解决的因果复杂性问题。此外, 它不仅适合案例数在10或15以下的小案例研究, 也适合100个案例以上的大样本, 还



适合10或者15~50之间的中等样本(杜运周等, 2017)。本研究25个样本量属于中等样本,样本规模与QCA方法匹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外部效度的同时,还可保留案例的独特性与深度。

本文选择前文提到的创业意向(EI)、创业机会识别(EOI)、管制制度(RD)、规范制度(ND)、认知制度(CD)等5个条件变量以及创业活动(EA)这一结果变量以外,不再引入其他变量。因为条件增加很容易导致组态个数超过观察案例个数,从而出现案例的有限多样性问题,对于中等样本的研究,理想的条件个数一般在4~6或7之间(伯努瓦·里豪克斯等, 2017)。因此,选择5个条件变量符合要求。QCA主要分为清晰集QCA(Crisp-set QCA,简称CsQCA)与模糊集QCA(Fuzzy-set QCA,简称FsQCA)。本研究采用被广泛使用的FsQCA进行分析,事实上,CsQCA只是FsQCA的一个特例(Schneider&Wagemann, 2012)。

### 3 QCA分析

#### 3.1 数据收集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GEM的年度报告。GEM项目由美国百森商学院与英国伦敦商学院发起,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调查,比较多个国家的创业水平,数据在创业领域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实用性。GEM每年在各被研究国家调研2000位以上个体,案例具备广泛性和较好的代表性。

遵循QCA对于中小样本的案例选择原则——“保证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和案例总体内的最大异质性”(伯努瓦·里豪克斯等, 2017)。案例限定在2015—2017年基于以下原因:(1)响应引言中的现实问题——近3年来我国TEA指数开始大幅下滑,选择此时段能够保证时效性,有针对性地探索问题;(2)GEM项目每年调查的国家并

不完全固定,3年的跨度能够最大限度的覆盖代表性强的案例国家,如果延长跨度将会减少原本就数量有限的案例数,从而有可能面临“有限多样性”问题;(3)研究案例及变量在3年内相对稳定,有创业活跃度高的“正面”案例,也有创业活跃度低的“负面”案例,有利于挖掘可推广性的结论。

本文对案例及数据进行了甄选和清理:(1)3年内至少参与1次调研的效率驱动国家有39个。其中,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有29,30,25个;(2)保留连续3年都参与调研的案例,共20个,保留有2年都参与调研的案例,共7个;(3)剔除仅有1年参与调研的案例,共12个;(4)剔除数据异常案例Turkey、Saudi Arabia<sup>③</sup>。综上,进入QCA分析的案例共有25个,如表1所示。

#### 3.2 变量的选择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GEM的研究对以下变量进行界定。其中成人群体是指被调查国家中18~64岁的人群。创业活动(EA)、创业意向(EI)、创业机会识别(EOI)、规范制度(ND)采用各指标所占百分比测量,管制制度(RD)、认知制度(CD)采用李克特5点测量法来测量充分性,得分越高,充分性越大。制度环境各要素的测量取题项均值,详见表2。

研究变量的原始数据见表3(3年内,25个案例共有75个观察点,本研究对各变量进行了平均化处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4。

#### 3.3 变量的校准

给案例赋予集合隶属的过程是校准(Schneider等, 2012; 杜运周等, 2017)。把变量再校准为集合,需要依据由理论和实际的外部知识或标准设定3个临界值:完全隶属、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转变后的集合隶属介于0~1之间。参考先前的研究(Fiss, 2011),本文将5个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

<sup>③</sup>Saudi Arabia、Turkey有2年参加调查。然而,2015年Turkey未报告本研究6个变量的数据,实际仅有2016年的数据,故剔除。在后续QCA分析中,除CD外,各条件变量都高时,唯有Saudi Arabia产生了非高创业活跃度,这与创业主流理论相左,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故删除。

高创业活跃度的3个锚点分别设定为样本数据的上4分位数,上、下4分位数的均值,下4分位数。而对于非高创业活跃度而言,其校准规则与高创业活跃度正好相反,即取高创业活跃度的非集(negation)。各变量的校准锚点如表5所示。

3.4 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fsQCA3.0软件分析25个效率驱动国家案例的创业活动数据,识别出决定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遵循Fiss(2011)的建议,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同时,参考杜运周等(2017)的建议,将PRI

表1 研究案例的基本情况<sup>④</sup>

研究案例	所属地区	人口/百万	GDP/十亿美元	人均GDP/美元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排名
Egypt	非洲	91.5	330.8	3 340	115/138
Morocco		34.4	103.1	3 040	70/138
South Africa		55.0	313.0	6 050	47/138
China	亚洲	1 371.2	10 982.8	7 820	28/138
Lebanon	欧洲	5.8	51.2	7 930	101/138
Malaysia		30.3	296.2	10 570	25/138
Indonesia		257.6	859.0	3 440	41/138
Thailand		68.0	395.3	5 620	34/138
Bulgaria		7.2	49.0	7 220	50/138
Croatia		4.2	48.9	12 690	74/138
Latvia		2.0	27.0	14 900	49/138
Macedonia		2.1	9.9	4 787	68/138
Hungary		9.9	120.6	12 240	69/138
Poland		38.0	474.9	13 370	36/138
Slovakia	拉丁美洲	5.4	86.6	17 310	65/138
Argentina		43.4	585.6	14 510	104/138
Brazil		207.8	1 772.6	9 550	81/138
Chile		17.9	240.2	14 060	33/138
Colombia		48.2	293.2	7 130	61/138
Ecuador		16.1	98.8	6 010	91/138
Guatemala		16.3	63.9	3 590	78/138
Mexico		127.0	1 144.3	9 710	51/138
Panama		3.9	52.1	12 050	42/138
Peru		31.3	192.1	6 200	67/138
Uruguay		3.4	53.8	15 720	73/138

表2 变量选择与赋值

变量	数据来源	二级指标	变量定义与描述
创业活动 (EA)	GEM 成人调查报告	—	参与企业创建或运营企业少于3年半的人群数量比例
创业意向 (EI)	GEM 成人调查报告	—	未来3年半内打算创业的人群比例
创业机会识别 (EOI)	GEM 成人调查报告	—	在其所处地域能够发现创业机会的人群比例
管制 (RD)	GEM 专家调查报告	政府支持政策	政府出台政策法规并监督落实,保护创业者的法律权利
	GEM 专家调查报告	税收和管理体制	政府简政放权,对新创企业制定减免税收等政策
规范 (ND)	GEM 成人调查报告	公众认可创业	大部分人认为成为创业者是令人渴望的
	GEM 成人调查报告	社会尊重创业	成功的创业者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并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认知 (CD)	GEM 专家调查报告	创业基础教育	中小学阶段提供如何开办与管理中小企业教育或培训
	GEM 专家调查报告	创业高等教育	大学阶段提供如何开办与管理中小企业教育或培训

④人口指标与人均GDP指标皆来源于2017年数据(除Turkey、Macedonia、Hungary 案例指标来源于2015年外),GDP指标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排名(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ank)指标皆来源于2015年数据。



一致性 (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 的阈值设定为 0.70, 案例阈值设定为 1, 最终保留 6 个高创业活跃度的案例, 14 个非高创业活跃度的案例。

### 3.4.1 必要条件分析

在进行模糊集真值表程序分析之前, 检查必要条件是有用的。一个必要条件可以被视为结果的

一个超集 (super set)。需要重点说明的是, 如果必要条件被包括在真值表分析中, 它可能会在纳入“逻辑余项”的解中被除去, 即必要条件可能被简约解消除 (伯努瓦·里豪克斯 et al, 2017)。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检测见表 6。

由表 6 可知, 各个单项前因条件影响高或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性均未超过 0.9, 不构成必

表 3 案例样本国家的原始数据

研究案例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心理认知层		国家制度层			
	<i>EI</i> %	<i>EOI</i> %	<i>RD</i>	<i>ND</i> % <sup>⑤</sup>	<i>CD</i>	<i>EA</i> %
Argentina	23.49	39.94	2.24	55.82	2.40	12.74
Brazil	22.43	43.01	1.80	78.87	1.91	20.28
Bulgaria	5.81	18.78	2.33	61.85	2.06	4.00
Chile	46.82	54.42	2.79	66.76	2.20	24.64
China	18.70	34.75	2.95	72.10	2.47	11.00
Colombia	50.09	54.02	2.27	71.55	2.61	22.90
Croatia	17.64	26.81	1.65	53.58	1.87	8.34
Ecuador	43.74	49.78	2.11	61.78	2.85	31.67
Egypt	59.61	48.51	2.13	82.11	1.57	13.78
Guatemala	40.12	49.81	1.90	85.71	2.33	20.84
Hungary	14.93	27.73	1.72	60.14	2.06	7.93
Indonesia	26.26	46.93	2.99	75.85	3.16	13.07
Latvia	19.50	34.30	2.32	57.45	2.73	14.15
Lebanon	38.99	54.83	2.12	81.95	2.96	25.14
Macedonia	24.09	38.07	2.51	61.87	2.52	6.32
Malaysia	9.36	32.91	2.84	55.27	2.68	9.74
Mexico	13.45	40.56	2.68	51.09	2.52	17.58
Morocco	31.02	38.98	2.34	67.05	1.78	6.25
Panama	14.81	45.94	2.51	62.63	1.96	14.06
Peru	41.75	54.56	2.12	68.08	2.49	23.99
Poland	16.83	47.07	2.33	63.54	1.96	9.57
Slovakia	8.54	24.43	1.83	54.56	2.39	10.63
SouthAfrica	10.90	39.70	2.28	74.14	2.16	9.02
Thailand	25.56	42.60	2.51	72.90	2.39	17.53
Uruguay	26.10	34.87	2.27	56.14	2.23	14.38

表 4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统计指标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心理认知层面		国家制度层面			
	创业意向 ( <i>EI</i> ) %	创业机会识别 ( <i>EOI</i> ) %	管制 ( <i>RD</i> )	规范 ( <i>ND</i> ) %	认知 ( <i>CD</i> )	创业活动 ( <i>EA</i> ) %
均值	26.02	40.93	2.30	66.11	2.33	14.78
标准差	14.13	9.77	0.36	9.70	0.38	6.92
最小值	5.81	18.78	1.65	51.09	1.57	4.00
最大值	59.61	54.83	2.99	85.71	3.16	31.67

⑤Brazil 缺乏 2016, 2017 年的 *ND*, 用 2015 年的 *ND* 来代表。3 年内 Lebanon 都缺乏 *ND*, 且仅 2009 年显示 *ND* 数据, 用 2009 年的 *ND* 来代表。Panama 缺乏 2015 年的 *ND*, 取 2016, 2017 的 *ND* 均值来代表。

表5 各变量校准锚点

研究变量			目标集合	锚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条件变量	心理认知层	创业意向 ( $EI$ ) /%	高创业意愿	38.990	26.960	14.930
		创业机会识 ( $EOI$ ) /%	高创业机会识别	48.510	41.630	34.750
	国家制度层	管制 ( $RD$ )	优良的管制制度	2.510	2.315	2.120
		规范 ( $ND$ ) /%	优良的规范制度	72.900	65.175	57.450
		认知 ( $CD$ )	优良认知制度	2.520	2.290	2.060
结果变量	创业活动 ( $EA$ ) /%		高创业活跃度	20.280	14.925	9.570
			非高创业活跃度	9.570	14.925	20.280

表6 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性检测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创业活跃度	非高创业活跃度
心理认知层	$EI$	0.752	0.271
	$\sim EI$	0.400	0.847
	$EOI$	0.827	0.327
	$\sim EOI$	0.285	0.760
国家制度层	$RD$	0.458	0.552
	$\sim RD$	0.655	0.536
	$ND$	0.689	0.396
	$\sim ND$	0.375	0.654
	$CD$	0.724	0.479
	$\sim CD$	0.375	0.598

要条件。这意味着各个单项前因条件对创业活跃度的解释力较弱。因此,下文将这些前因条件纳入FsQCA,进一步探索产生高、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 3.4.2 组态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会得到3类解:复杂解(不包含“逻辑余项”)、简约解(包含“逻辑余项”,但不评价其合理性)、以及中间解(仅限于将符合理论和实际知识的“逻辑余项”纳入解),其中,中间解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它们不允许消除必要条件,一般而言,中间件优于另外2种解(伯努瓦·里豪克斯等,2017)。

根据简约解和中间解来区分组态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若一个前因条件同时出现于简约解和

中间解,则为核心条件,它是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条件;若此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则将其记为边缘条件,它是起辅助贡献的条件(杜运周等,2017)。

经过反事实分析来获得中间解,即假设每个条件变量的出现(present)都有可能提升创业活跃度<sup>⑥</sup>,模糊集分析得出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路径)有2条(如表7所示),且2个组态的一致性指标分别为0.778、0.931,这说明2个组态都是高创业活跃的充分条件。而解的一致性指标为0.904,则进一步说明覆盖绝大部分案例的2个组态也是高创业活跃度的充分条件。模型解的覆盖度为0.585,说明2个组态解释了约60%的高创业活跃度的原因。同时,假设每个条件变量缺失(absent)都可能导致非高创业活跃度<sup>⑦</sup>,模糊集分析得出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路径)有3条,覆盖绝大部分案例的3个组态不仅构成了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充分条件,而且解释了约82%的非高创业活跃度原因。

相关符号说明如下:参考Ragin等(2008)的表述方式,用●表示条件变量出现,用⊗表示条件变量不出现。其中,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边缘条件。空格表示条件变量无关紧要(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1) 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析。鉴于各

⑥根据此假设,进一步选择只包含上述条件出现的质蕴涵项(prime implicants)—— $EI \times CD, EOI \times EI \times RD$ 。

⑦根据此假设,进一步选择只包含上述条件缺失且最简化的质蕴涵项(prime implicant)—— $\sim EI \times \sim CD$ 。

表7 产生高、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条件变量	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High EA)		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Not High EA)		
	H1	H2	NH1		NH2
			NH1a	NH1b	
创业意向 (EI)	●	●	⊗		
创业机会识别 (EOI)	●	●	⊗	⊗	⊗
管制 (RD)	●				
规范 (ND)	●				⊗
认知 (CD)		●		⊗	⊗
一致性	0.778	0.931	0.882	0.931	0.976
覆盖度	0.196	0.535	0.700	0.430	0.378
唯一覆盖度 (Unique Coverage)	0.050	0.389	0.315	0.045	0.075
解的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	0.904			0.880	
解的覆盖度 (solution Coverage)	0.585			0.820	

组态均涉及心理认知层面的核心条件  $EOI$ 、 $EI$  等,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组态的在制度层面的差异,本文归纳出以下 2 种激活创业活动的组态(路径),即管制—规范主导型与认知主导型。同时,归纳出 3 种抑制创业活动的组态(路径)。现阐述如下。

① 管制—规范主导型。H1:  $EI \times EOI \times RD \times ND$ ,表明无论创业认知制度优良与否,只要政府积极扶持创业企业,且社会规范制度优良,创业意向高的潜在创业群体具备较强的机会识别能力,他们就会投身于创业活动。根据创业事件理论,合意性感知是指“创业成功对自己内部或外部的吸引力,即创业是否符合自己的期望”,它会直接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意向和行动,而管制制度与社会规范制度对合意性感知有直接影响(葛宝山等, 2013; 张秀娥等, 2016)。具体而言,当潜在创业群体捕捉到创业机会且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创业成功,而创业成功受到的政府支持、社会肯定、尊重等可以满足个人需求时,创业意愿就被不断强化,从而驱动创业活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较弱,经济选择自由度相对较小的效率驱动国家,当政府及社会规范呈现对创业高度认可、尊重和支持时,潜在创业群体出于实现经济属性上的自给自足、脱离贫穷和增加收入,以及社

会属性上提升社会地位的考虑,会更加努力地识别或创造创业机会,从而开展创业活动。研究也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支持性的社会规范对创业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社会规范通过促进潜在创业者感知机会的中介传导机制,进一步激活创业活动(郑馨等, 2017)。本文验证了社会规范制度对创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表明社会规范制度与政府管制制度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存在协同增效作用。

此组态的典型案例分析是智利,据报道(人民网, 2017),自 2010 年智利政府主导成立“启动智利”创业平台以来,简化外国创业者办理签证的时间,每年用于支持企业创业的资金大约是 1000 万美元,还为选定的企业提供 4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创业者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创业生态系统不断优化,根据全球创业发展研究所发布的 2016 年度全球创业指数报告,智利成为拉美地区唯一进入前 20 的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此组态还表明当管制制度与规范制度鼓励创业时,认知制度与高创业活跃度无关。具体地,一旦政府、社会大力鼓励及支持创业,潜在创业群体会积极地投身创业活动,此时:如果创业认知制度优良,那么潜在创业群体会识



别或创造更优质的创业机会,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而创业成功榜样作用又吸引着人们更加踊跃从事创业;反之,如果创业认知制度欠佳,即如果潜在创业群体没有受过系统的创业教育或培训,那么其创业理论不足的新进入缺陷可以通过获得创业“合法性”及社会规范的支持来弥补,他们的创业能力会在创业实践中不断提升,能更好地规避创业失败风险,从而吸引更多的人积极投身创业活动。

② 认知主导型。H2:  $EI \times EOI \times CD$ , 表明无论国家管制制度或规范制度优良与否,只要营造良好的认知制度,创业意向高的潜在创业群体具备较强的创业机会识别能力,他们就会投身于创业活动。根据创业事件理论,可行性感知是指“个体对自己成功创业的能力的感知,也就是对自身能否创办企业的判断”,它会直接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意向和行动,而先前的知识或经验对可行性感知有直接影响(葛宝山等, 2013; 张秀娥等, 2016)。具体地,创业者在采取某个特定行动时,会根据既有知识及技能来设想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和困难,进而判断创业所必需的信息、技术、能力和毅力等,而优质完善的创业认知制度通过让创业者提前参与到实际创业情境中,解决实际创业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能够积累丰富而优质的创业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对潜在风险的警觉,使创业者在充满不确定的创业环境中迅速感知变化并提前采取行动(Harmeling等, 2013),使其创业成功预期提升,从而强化创业意愿,激活创业活动。这对处于经济转型的效率驱动国家尤为明显,伴随着基本需求的不断改善,人们渴望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当将优化创业认知制度作为促进社会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的着力点时,系统地接受创业教育和培训的潜在创业者,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更加相信其具备创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应对潜在创业风险,从而提高其可行性感知,进而强化创业意向,激活创业活动。相关研究也表明,良好的

认知制度会使企业家具有良好的技术积累与管理知识水平,增加对机会的把握能力和判断力,提升创新绩效(李文静等, 2015)。

此组态的典型案例分析是厄瓜多尔,据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7),近年来,国际油价较为低迷,导致厄瓜多尔经济下行,失业人口增多,然而,由于优良的创业认知制度,大学及社会拥有健全的创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创业,他们主要的创业方向包括科技创新、商贸、小微企业等,这些新兴企业也为厄瓜多尔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仅2016年—2017年3月底,就创造31.6万个新工作岗位。

值得注意的是,此组态还表明,当认知制度优良时,管制制度、规范制度与高创业活跃度无关。具体地,一旦国家具备健全优质的创业教育或培训体系,潜在创业群体会积极地投身创业活动,此时:如果管制制度或规范制度优良,那么潜在创业群体的有利性感知也会提升,从而进一步强化创业意愿,激活创业活动;反之,如果管制制度或规范制度欠佳,即如果政府、社会对创业的支持度不高,那么由于具有良好的创业知识和技能,潜在创业群体不仅能有效规避创业风险,而且坚信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获得合法性及社会认可,从而激活创业活动。

通过对比2个组态发现,根据覆盖度指标,H2是H1的近3倍,它解释了结果变量的54%,覆盖5个案例,更可能有效地激活创业,即大部分国家是通过H2路径取得高创业活跃度。这充分说明了创业认知制度作为无形的社会嵌入和非正式制度形式,能够深层次、强有力地影响经济活动,尤其对创业的影响甚至超过一些正式制度因素。

通过对比2个组态还发现,高创业意向与强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存在互补作用,同时,2条路径所涉及的制度三要素在解释创业活动时存在替代作用,即如果创业意愿与创业机会识别能力较高,只

要满足认知制度优良这单个条件,或者同时满足管制制度与规范制度优良这2个条件,就可促进高的创业活跃度。

(2) 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析。鉴于QCA方法的因果非对称性意味着某个结果的出现与否需要不同的“原因组合”来分别解释(伯努瓦·里豪克斯等, 2017)。因此,为更全面深入地探索激活创业的驱动机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导致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路径),结果分析如表7所示。

组态 NH1a:  $\sim EOI \times \sim EI$ , 表明无论制度环境优越与否,只要缺乏高创业意向的潜在创业群体缺乏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创业活动就会受到抑制。可能的原因是,一旦潜在创业群体创业意向不高、缺乏对创业的承诺,其很可能预期创业失败,并对创业失败充满恐惧。此时,欠佳的制度环境会加剧创业失败的风险,从而抑制创业。反之,即使优越的制度客观上降低了创业失败的风险,然而,从潜在创业群体感知优越的制度,进而转变其悲观预期存在明显的“时滞”。而且,创业活动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创业机会很可能转瞬即逝,此时,若潜在创业群体缺乏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会进一步抑制创业活动。现有研究也表明,管制、规范的制度环境更多地为创业活动提供一个框架或活动空间,框架本身并不会对创业活动发生直接作用,而是由潜在创业者对框架的了解和把握形成创业认知,进而作用于创业行为(倪嘉成等, 2017)。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中国、匈牙利、南非等国。

组态 NH1b:  $\sim EOI \times \sim CD$ , 表明无论管制制度与规范制度优越与否,一旦认知制度欠佳且缺乏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即使创业意向高,也不能产生高创业活跃度。此类组态的案例是摩洛哥,保加利亚等国。组态 NH2:  $\sim EOI \times \sim ND \times \sim CD$ , 表明无论管制制度优越与否,一旦规范与认知制度欠佳且缺乏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即使潜在创业群体的创业意向高,也不能产生高创业活跃度。此类组

态典型的案例是波兰、拉脱维亚等国。比较组态 NH1 与组态 NH2 的覆盖度指标,组态 NH1a 分别是组态 NH1b、NH2 的近 1.5 倍、2 倍,它解释了结果变量的 70%,覆盖 11 个案例,即大部分国家是因为 NH1a 抑制了高创业活跃度。通过对比上述 3 个组态还发现,心理层与制度层在解释非高创业活跃度时也存在替代作用,即当缺乏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时,只要创业意向较弱,或认知制度欠佳,就会抑制创业。

比较影响创业活跃度的 5 个组态发现,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非高创业活跃度的 3 条路径并不是高创业活跃度的 2 条路径的对立面。同时,管制制度也具有非对称性。即优越的管制制度与优越的规范制度、高创业意向及高机会识别能力组合时能激活创业活跃度(H1),而优越的管制制度与优越的规范制度、高创业意向缺乏及高机会识别能力缺乏组合时能抑制创业活跃度(NH1a)。

## 4 结论与展望

###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5—2017 年度的 GEM 报告中的效率驱动国家为样本,从心理认知层面与国家制度环境层面出发,应用组态思维和 QCA 方法整合上述 2 个层面 5 个条件因素,探讨影响国家间创业活跃度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本研究获得以下结论:(1) 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 2 条路径,即管制—规范主导型与认知主导型。其中,第一条路径指高创业意愿、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优良管制制度与规范制度的联动匹配,第二条路径指高创业意愿、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与优良的认知制度的联动匹配;(2) 较之于管制—规范主导型,认知主导型更可能有效地激活创业,即认知制度作为无形的社会嵌入和非正式制度形式,能够深层次、强有力地影响经济活动;(3) 2 条路径所涉及的制度三要素在解释创业活动时存在替

代作用,即创业意愿与创业机会识别能力较高时,只要管制制度与规范制度同时优良,或者认知制度优良,即可驱动高创业活跃度;(4)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3条路径,且与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此外,为检验本结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特选取中国这个非高创业活跃度国家作为案例,进一步验证分析。本研究结论表明,无论制度环境优良与否,只要缺乏高创业意向与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高创业活跃度就会受到抑制,这在中国情境下同样得到了验证。《2016年安利全球创业报告》(2016)显示,中国的创业指数从上一年的79%下降至74%,排位从与印度并列第一,下滑至第4位。张玉利认为,“此结果主要有两大原因:对宏观经济并不乐观的预期遏制了创业意愿;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虽看起来创造出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创业机会,但实际上留给新创业者的机会已经不多”。

#### 4.2 理论贡献

(1) 本研究整合宏观制度层面与微观心理认知层面的5个关键条件变量来考察创业驱动机制。以往研究局限于制度环境或心理认知的某一层面,2个层面的要素协同联动影响创业活动的内在机制尚不明确(方世建等,2012;郑馨等,2017)。因此,本研究丰富了制度理论在创业微观心理认知层面的发现,深入剖析制度逻辑与微观心理认知层面的协同联动机制,即整合制度各要素与创业意向和创业机会识别,不仅发现影响创业的5条路径机制,还发现更高效的创业驱动路径,这有助于揭开制度环境影响创业活动的黑箱,使制度逻辑与微观主体的联动机制浮出水面。同时,强调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并非由某一层面的要素单独决定,而是有赖于制度环境与心理认知2个层面要素组成的不同前因组态,如解释规范制度影响创业活动的结论不一致现象时,可能还要考虑规范与制度层的其他要素或其他层面条件要素的匹配

情境,这改善了以往研究忽视跨国情境下多重因素并发可能对创业的影响,致使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困境(Kiss et al, 2012; Lim et al, 2016)。

(2) 本研究运用QCA方法发现了影响创业活动的组态内部各要素之间替代性与互补性。对于高创业活跃度而言,高创业意向与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相辅相成,同时,在此条件下,制度环境中的3要素在解释创业活动时存在替代作用,即优良的管制制度、规范制度与优良的认知制度在促进创业方面起完全替代作用。而且,在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内各要素也存在类似特性。这充分体现了QCA在解释组态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时的优势,尤其是各要素的替代性与互补性,这不仅突破了对于标准的统计分析方法而言依然是黑箱的局限(Fiss et al, 2011),也为今后探究复杂创业现象时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3) 本研究用QCA方法发现创业活动的驱动机制存在因果的非对称性。导致高创业活跃度高的路径与导致非高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并非截然相反,即并不能根据产生高创业活跃度原因的对立面来直接推导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原因。同时,本文还发现优良管制制度的非对称性,即它与不同的条件组合时,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这充分体现了QCA方法突破了线性回归中因果关系效应的统一的对称性假定(程聪等,2016),能挖掘出某个结果出现与否的更加细腻的解释,能更好地解释效率驱动国家创业活动的差异性和条件间相互依赖的组态效应。

#### 4.3 管理启示

(1) 开拓进取,强化创业意向与机会识别能力。高创业意向与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是激活创业的核心要素,对于潜在创业群体而言,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想不想创业”与“能不能创业”的问题。回溯数据发现,尽管我国制度环境的各要素指标都比较良好,甚至在效率驱动国家中名列



前茅,但是创业意愿与创业机会识别能力都较低,这也回应了文中引言提到的“近3年来,我国创业活跃度不断下滑,甚至远低于效率驱动国家平均水平”的困境。这启示着要充分发挥创业主观能动性,大力提倡勇于冒险、开拓创新、百折不挠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强化创业意向、勇于发现、创造与利用创业机会。

(2) 博采众长,立足本土创业实践。对于效率驱动国家来讲,除在心理认知层面注重激活创业意愿与强化创业机会识别能力之外,国家制度层面的举措对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也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根据管制—规范主导型与认知主导型,制度环境中的三要素在解释创业活动时存在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制度环境各要素不必同时优良。事实上,制度环境也不可能总是良好,创业总是在不断发现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推进,提升创业活跃度的模式并非千篇一律。这启示我国不仅要汲取他国创业经验,更要立足于本土实践,探索符合我国创业实践的制度环境,坚定地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 百年大计,优化创业认知制度。认知主导型对创业有更强大的促进作用,效率驱动国家的认知制度基础薄弱,创业教育程度不充分,人力资本贫乏。然而,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创业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的。这启示我国应不断借鉴全球创业认知制度的优秀成果,大力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尤其要注重发挥高校等机构的重要作用,如开设创业相关课程,聘请优秀创业导师、组建创业团队、设立创业孵化平台、建立“高校—企业—政府”协同培养机制等,激活创

业意愿、提升创业机会识别能力,鼓励优秀大学生积极投身创业活动,这也是改善我国创业水平、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着力点。

(4) 不走极端,深入推进“双创”战略。影响创业活动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原因并不能根据高创业活跃度的原因来逆向推导。这启示我国应该理智看待创业,不该盲目地认为高创业活跃度经验的对立面都是我国创业活跃度不佳的教训。同样地,也不该极端地认为彻底改变导致我国创业活跃度欠佳的因素就能激活创业。同时,改善我国创业活跃度困境的亟需理解客观的创业制度与主观创业制度感知的联系,激活创业的关键在于提升创业意向与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尽管短期内的制度支持并不能对创业产生直接影响,但创业制度感知的提升离不开创业制度的长期改善。因此,需要将创业视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深入落实“双创”战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坚持创新引领创业,创造更多新兴创业机会,激发潜在创业群体的内生动力,进而提升我国的创业水平。

####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所提出的效率驱动国家创业活跃的前因组态仍然存在如下局限:(1) 由于案例详细程度以及案例数量限制,研究提出的前因条件数量受到一定限制;(2) 除静态制度环境外,并没有考虑制度环境的动态性,而且创业环境还包括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要素,这有可能导致案例覆盖度的减少;(3) 受限于创业失败的文献研究较为稀缺,并未深入探讨我国之外的效率驱动国家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原因,今后可进一步探讨。

#### 参考文献

- 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 C·拉金. 2017. 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M]. 杜运周,李永发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蔡莉,朱秀梅,刘预. 2011. 创业导向对新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9(4):601-609.

- 程聪,贾良定. 2016.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清晰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19(6):113-121.
- 杜运周,贾良定. 2017.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6:155-167.
- 方世建,孙薇. 2012. 制度创业:经典模型回顾、理论综合与研究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34(9):15-25.
- 高辉. 2017. 中国情境下的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 葛宝山,蒋海燕. 2013. 创业意图经典模型评介与整合研究框架构建[J]. 外国经济与管理,35(11): 11-20.
- 郭海,沈睿. 2014. 如何将创业机会转化为企业绩效: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及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34(3):70-83.
- 胡玲玉,吴剑琳,古继宝. 2014. 创业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响[J]. 管理学报,11(10):1484-1490.
- 李文静. 2015.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D]. 长春:吉林大学.
- 李新春,叶文平,朱沅. 2017. 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基于GEM数据的跨国(地区)比较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8:112-126.
- 罗瑾琨,杨光华. 2015. 性别视角下“中国三明治”创业者创业行为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5:105-114.
- 倪嘉成,李华晶. 2017. 制度环境对科技人员创业认知与创业行为的影响[J]. 科学学研究,35(4):585-592.
- 人民网. 2017. 创新创业,从改变观念开始[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605/c1002-29316568.html>,06-05.
- 任胜钢,贾倩,董保宝. 2017. 大众创业:创业教育能够促进大学生创业吗?[J]. 科学学研究,35(7):1063-1072.
- 斯晓夫,王颂,傅颖. 2016. 创业机会从何而来:发现,构建还是发现+构建?创业机会的理论前沿研究[J]. 管理世界,3:115-127.
- 苏郁锋,吴能全,周翔. 2017. 制度视角的创业过程模型: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181-192.
- 汤明,沈超红. 2009. 创业自我效能感研究综述[J]. 改革与开放,5:124-125.
- 王玲玲,赵文红,魏泽龙. 2017. 创业制度环境、网络关系强度对新企业组织合法性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14(9):1324-1331.
- 项国鹏,李武杰,肖建忠. 2009. 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制度能力:中国企业家的实证研究及其启示[J]. 管理世界,11:103-114.
- 闫佳祺,罗瑾琨,贾建锋. 2018. 组织情境因素联动效应对双元领导的影响:一项基于QCA技术的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39(4):150-160.
- 杨俊,张玉利,刘依冉. 2015. 创业认知研究综述与开展中国情境化研究的建议[J]. 管理世界,9:158-169.
- 张秀娥,张坤. 2016. 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作用机制研究回顾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38(4):104-112.
- 赵向阳,李海,Andreas,等. 2012. 创业活动的国家差异:文化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J]. 管理世界,8:78-90.
- 郑馨,周先波,张麟. 2017. 社会规范与创业:基于62个国家创业数据的分析[J]. 经济研究,11:59-73.
- 中国经济网. 2016. 安利全球创业报告:烧钱创业退虚火大众创业是未来[EB/OL]. [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612/17/t20161217\\_18792717.shtml](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612/17/t20161217_18792717.shtml),12-1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7. 厄瓜多尔发展和创业创新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具有积极意义[EB/O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1/201705/20170502568264.shtml>, 05-03.
- Ali D F. 2013. The process of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n entrepreneurship perception and intention [J]. Education & Training, 55(8-9):868-85.
- Alvarez S A, Barney J B. 2007. Discovery and creation: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on[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1 - 2):11 - 26.
- Alvarez S A, Barney J B, Anderson P. 2013. Forming and exploiting opportunities: The implications of discovery and creation processes for entrepreneurial and organizational research[J]. Organization Science,24(1):301-317.
- Bird B. 1988. Implementing entrepreneurial ideas: The case for inten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3(3):442-53.
- Bruton G D, Ahlstrom D, Li H L. 2010.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ntrepreneurship: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do we need to move in the futur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4(3):421 - 40.

- Busenitz L W, Gómez C, Spencer J W. 2000. Country institutional profiles: Unlocking entrepreneurial phenomena[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5):994-1003.
- Carsrud A, Brännback M. 2011.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s: What do we still need to know?[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49(1):9 - 26.
- Fiss P C. 2007. A set-theoretic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4): 1180-1198.
- Fiss P C. 2011.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4(54):393-420.
- Harmeling S S, Sarasvathy S D. 2013. When contingency is a resource: Educating entrepreneurs in the balkans, the bronx, and beyond[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7(4):713 - 44.
- Kostova T, Roth K. 2002. Adop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by subsidiari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stitutional and relational effect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1):215-33.
- Krueger N F. 2000. The cognitive infrastructure of opportunity emergenc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4:185-206.
- Lim D S K, Chang H O, Clercq D D. 2016. Engage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Interactive effects of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5(4):933-45.
- Low M B, Macmillan I C. 2007. *Entrepreneurship: Past Research and Future Challenges*[M]. Berlin: Springer.
- Lumpkin G T, Lichtenstein B B. 2005.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the opportunity-recognition proces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9(4):451 - 472.
- Kiss A N, Danis W M, Cavusgil S T. 2012.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emerging economies: A critical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7(2): 266-290.
- Manolova T S, Eunnir R V, Gyoshev B S. 2008.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for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2(1):203 - 218.
- Misangyi V F, Greckhamer T, Furnari S, et al. 2017. Embracing causal complexity: the emergence of a neo-configurational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43(1): 255-282
- North D.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zgen E, Baron R A. 2007. Soci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Effects of mentors, industry networks, and professional forum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2(2): 174-92.
- Ragin C C. 2008.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ynolds P, Bosma N, Autio E, et al. 2005.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Data collec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1998 - 2003[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4(3):205-231.
- Rihoux B, Ragin C C. 2009.*Configurational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Schneider C Q, Wagemann C. 2012.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6(2):165-166.
- Scott W R. 2001.*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M].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 Shane S, Venkataraman S. 2000.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1):217-26.
- Shane S. 2012. Reflections on the 2010 AMR decade award: Delivering on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7(1):10-20.
- Short J C, Ketchen D J, Shook C L, et al. 2010. The concept of “opportunity”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ast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36(1):40-65.
- Sommer L, Haug M. 2011. Intention as a cognitive antecedent to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understanding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 Management Journal*, 7(1):111-42.
- Suddaby R, Bruton G D, Si S X. 2015.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a qualitative lens: Insi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or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0(1):1-10.
- Timmons J A, Spinelli S. 2010. *New ventur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M].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 Wu S, Wu L. 2008.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 Enterprise Development*, 15(4):752-74.
- Whetten D A, Felin T, King B G. 2009. Comparative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cross multiple levels: A set-theoretic approach[J].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26(26):91-116.

## Whe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and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can Stimulat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A Study based on QCA Approach

CHENG Jianqing<sup>1,2</sup>, LUO Jinlian<sup>1</sup>, DU Yunzhou<sup>3</sup>, YAN Jiaqi<sup>1</sup>, ZHONG Jing<sup>1</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0,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25 Efficiency-driven economies as a sample, and applies the configurational thinking and QCA approach to integrate five conditions from institutional contexts and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multiple conjunctural causation of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mong these economies.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hig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s divided into two recipes, namely, regulation & norm-based recipe and cognition-based recipe. (2) Cognition-based recipe is more likely to effectively stimulate high level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compared to regulation & norm-based recipe. (3)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stitution involved in above two recipes have an alternative effect in interpret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case of high level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s long as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is superior, or the regulatory dimension and normative dimension are both superior, high level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s attained. (4)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not hig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s divided into three recipes, which verifies the existence of asymmetric causality compared with hig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institutional contexts; configurational thinking; QCA approach